



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审定

发展经济学批判

陈俊明 主著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本书由全国高协组织教育发展中心、北京久富春教育科技发展中心、振兴中华
教育基金会 资助出版

全国高协组织教材研究与编写委员会审定

发展经济学批判

陈俊明 主著

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发展经济学批判

陈俊明 主著

出版发行：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排 版：新天地文印中心
印 刷：新颖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4
字 数：36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88-97477-2-3
定 价：3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展经济学批判

绪言

一、现行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批判

《发展经济学》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在这个领域，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家。但是，它最初却主要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并成为显学的。此后，又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从本国的国情出发研究它。在西方，人们习惯于将前者的理论看作是传统《发展经济学》，后者则属于非传统《发展经济学》。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学者站在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据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理论，力图引导发展中国家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老路，它实际上是现在通常所谓的《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分。

西方大部分经济学家有盲目的、浓厚的优越感，鄙视发展中国家。例如凯恩斯，极端仇视发展中国家，他在布雷顿会议上说：邀请 21 个落后国家参加会议“显然作不出什么贡献而不过充斥会场而已”，由于这些国家的参加，会议变成“一所多少年来结集在一起的最大猴舍。”^①话虽简短，却充满着对发展中国家的鄙视。他们之所以卖力地研究和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发展经济学》，目的就是向发展中国家灌输他们的理论和观念，诱导发展中国家远离社会主义。萨缪尔森说过：“由于未能把俄国的农奴解放出来，并且早点实现工业化政策，支付代价的不仅是俄国，而且是整个世界。”^②他们有正确的本能，害怕发展中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理论的立场和出发点就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背离的，当然必须深入批判。不过，如果以为这些西方学者要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既害怕这些发展中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愿意它们成为象日本那样的竞争对手，其目的无非是要它们长期依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这些西方学者在方法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适用于发达国家的一般的发展经济理论（并且不完整、科学）套到发展中国家中来。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论著中，西方学者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大谈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人还引用马克思的话：“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来证明发达国家早先的经验也适用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显然，他们是将自己的理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原理了。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李嘉图“强制抽象”错误的扩大再生产。正因为立场和方法的局限，他们甚至不清楚一定的理论都与历史条件相联系。

^① 参见《我的发展观》第一卷第 745 页，谭崇台文。

^② 参见陶文达主编：《发展经济学》第 27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③ 《资本论》第一卷第 8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并非发展中国家，而是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 19 世纪后期的德国。

以至于在涉及一般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场合，还将历史上相关的理论引进来。例如，在涉及人口理论的场合，经常搬出 19 世纪的马尔萨斯。且不说萨氏理论是一种极端仇视穷人的理论，是为当时的统治阶级特定的需要服务的，他的片面研究根本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风马牛不相及。这样拼凑，不免让人们想起马克思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的嘲笑：“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①

立场和方法限制的结果，就是理论内容本身的局限性。在热闹了一番之后，很快就暴露了它的非现实性。有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在 70—80 年代，原创的《发展经济学》已经不象 50—60 年代那样繁荣昌盛，而是转入低潮，“处于收益递减阶段。”^②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还宣称它“在兴盛一阵之后，已开始衰落”，也有说它已经“濒于死亡的困境”。可见，即使在西方，《发展经济学》本身也曾被批判过。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发展经济学》的早先版本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较广泛地发挥作用。除了这种历史的批判、实践的批判外，还有它自身的批判。鉴于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许多西方学者在经过批判和反思之后，又改弦易辙，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自从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以来，已经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本身就是一种内容的批判。

按照国内比较权威的说法，20 世纪 4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结构主义的思路占统治地位。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外部世界，也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结构，即中心——外围关系；在社会资源结构中，资本占最主要的地位，资本的匮乏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突出计划经济的管理结构；经济总体表现为一种内向型的结构。等等。按照这种的理论实践的结果，是在取得相当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不良后果。

从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起，《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一些经济学家，根据现实的经验反思了前一阶段的相关理论，特别是舒尔茨对原先的“无限供给剩余劳动”作出了符合实际的批评。印度的拉尔（Lal·D·K）在其《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中宣布《发展经济学》已走向死亡，说它背离市场经济，主张“直接控制教条”。缅甸出生的明特，明确使用“新古典主义复兴”。他们指出第一阶段的理论具有畸轻畸重之弊病，突出物质资本的形成，忽视人力资本的开发；突出工业化，轻视农业进步，突出计划管理，轻视市场机制；突出内向发展，轻视对外开放；突出“城市偏向”，让资源的配置主要是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而不顾农业部门的福利。特别是指出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第一阶段替代的主要产品是非耐用消费品，如服装、鞋帽等，替代的效益比较明显，负面的问题比较少；但转入该战略的第二阶段之后，替代的东西为耐用消费品、生产品和中间产品，它们要求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要进口新设备、新技术，造成外汇紧张，为保护农业，不得不采用物质控制，如关税、限额等，忽视价格机制。在内部将利率定得太低，在外汇汇率方面，将本币币值定得太高、不能反映资本的稀缺度。对进口工业品征收重税，扩大“剪刀差”。等等。这个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家纠正畸轻畸重的政策、重视人力资本的开发，改革经济体制，变内向型的进口替代为外向型的出口替代。看来，西方学者并没有丧失批判的意识和能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 15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② 转引自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原版序言第 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力。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新古典主义又有新的认识:它的分析超越时空,不考虑历史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它以单个厂商、消费者为分析单位,把个人看成孤立的、自利的个体,不受组织的、制度的约束,行为建立在个人偏好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上;新古典主义的世界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与现实不符;不重视具体制度的变迁,只重视效用、效率、均衡、成本—收益等范畴。以至不能说明和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寻租”行为。80年代后产生的新增长主义还批评新古典主义:忽视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和特点,忽视小企业家在处理不均衡时所作的贡献,以至经济分析局限于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这时的理论强调政治与经济的紧密联系,所以称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它包括新增长主义、新贸易理论,——在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使之从完全竞争模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新增长理论的繁衍过程中,还产生了知识经济概念。还出现了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后来,又有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这些发展批评新古典主义不注意知识、信息的应用可能改变以前的收益递减的状态,强调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作用,强调资源的配置是长期的问题。

①

《发展经济学》的推进,与经济时代、资本运动发展的变化有密切联系。或者说,是西方经济学学家对这种变化的某种反映。经济发展实践过程的推进,导致对先前理论的批评,理论就呈现出阶段性的发展。从批判的意义看,对前一阶段理论的超越,也包含对它的重大弊病的诊断和克服。从积极的意义看,也表明西方学者是与时俱进的、求实的。尽管他们的批判和推进并非完全科学。

从一定的意义看,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多少表现了这些学者的务实性,以及他们作为科学家的批判性。反观中国学术界,这种批判精神却显得比较薄弱。

《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理应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或由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深化。而不能靠编撰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发展理论来组合。实际上,也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根据本国的实际,研究自己的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但是,它们的影响并没有传统《发展经济学》那么大,于是世人就视之为非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在中国,也有些先知先觉的学者、伟人开始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如孙中山早就研究中国这样极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提出有名的“建国方略”。毛泽东等一批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讨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时,也经常进行一些开创性的研究。但总的来看,都没有建立起一门比较系统、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学科。

中国解放后,我们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卓绝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我们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照理应能创建出使西方学者相形见绌的《发展经济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却长期没有专门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而是将相关的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这样做当然有它的历史依据,但是,毕竟不够具体。显然,社会主义是有发展阶段之分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有不同的载体。由于意识形态及多方面的原因,《发展经济学》只是作为一种西方的经济思想来介绍的,真正较大

① 参看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新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规模的深入研究是文革结束以后。从我国的相关研究来看,虽然有许多学者一开始就注意不把它当成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但更多的则是倾力将它变成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在很长的时间内,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往往只注意介绍某些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而较少去分析他们理论的适用条件、发展阶段等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批评了一种不良倾向:有的人言必称希腊。事过半个多世纪后,类似的情况又重演了。现在,在我国流行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大也多存在着一种倾向,言必称西方《发展经济学》,在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作中却主要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最典型的是在许多教科书中,在谈到人口问题时,都用了很大的篇幅介绍马尔萨斯这样的地主阶级学者的理论,并且还抱有明显的好感,对他所谓的“人口陷阱”推崇备至。这种“嗜痂之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萨氏生活在十八世纪,他所说的情况根本不带普遍性,怎么能毫不批判地用来说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口问题?如此采摭思想材料,很容易将《发展经济学》编撰成西方《发展经济学》思想史,背离这门课程固有的理论逻辑。

在西方传统《发展经济学》中,的确提供了一些有影响、有价值的理论,例如“经济增长阶段论”、“两部门模型理论”、“国际依附理论”等等。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般的规律。从这种意义看,它的确有可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成份。但许多流行的教科书不能区分其中的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在介绍这些理论的同时,更连篇累牍地介绍只适用于西方国家的发展理论。这样做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个别理论与大多数理论不可以等量齐观。即便是同一层次的,也不可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后者根本不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提供,而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时提出的理论,而且不加批判。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些转述的著作中,西方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是没有区别的,《西方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也是没有区别的。由是,在这些流行的版本中,《发展经济学》成了《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发展史。

在西方学术界,传统《发展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立场、目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庸俗经济学有所不同,它没有古典经济学那样敢于进行“生理学”研究,也不象庸俗经济学那样围绕着“只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①,它的根本目的一是要为资产阶级的发财致富服务,为此就要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内在规定或浅层规律。至于深层的本质关系,出于固有的本能,那是不敢涉及的;二是要影响发展中国家,将它们圈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所以,在介绍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一些个别的、在较大程度上适用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时,也应该保持必要的批判态度。

诚然,传统《发展经济学》从理论体系看是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即使两种研究都包含着一些共同的规定,但在不同的国度、历史背景中,一般规定的实现是会有本质的差别的。只看到共同的一般规定而忽视其差别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有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②因此,在研究中国作为发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98页脚注(32),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批判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对我们来说,不是一般地研究适合全部发展中国的理论,而是研究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要承担这样的任务,批判是首要的。

大部分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版本还有一个倾向,将它当成研究一般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实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总是与发达国家相对而言的。它的外延很广,有大国有小国,有经济比较发展的,也有比较不发展的。有法治相对健全的,也有相反的情况。从辩证逻辑的角度看,随着外延的扩大,其内含就随之丰富。《发展经济学》既不能以其中的任何一国为典型,又不能离开发展中国家。因此,只能抓住全部发展中国的共同现象——就如形式逻辑所理解的一样,外延越广,内含越稀薄,——再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发展理论来分析。这样的著作,让人们看了之后,总有一种既熟悉又不中肯的感觉。如果说,这种著作出自南美某些小国的学者之手,还不必过于认真计较,那么,出于中国学者之手,就必然让人感到言不及意了。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又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经济发展要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还要遵循一般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规律。两种规律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力的平行四边形”^①。显然,单纯从一个方向上研究问题是很不够的。在理解了后一种规律的存在及其与前一种规律的相互关系之后,研究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就十分必要了。进而言之,中国是个大国,它的经济发展即使对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是典型经验,包含的一般规定也会比小国丰富些。中国的经济学家有责任和义务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同时也有必要展开对传统《发展经济学》错误倾向的批判。

一般说,一定的理论总是适应特定时代的社会的和阶级的需要而产生和推广的,都有一定的产生依据。人们当然不能将它们都当成永远适用的东西来看待。因此,对它们的批判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即使是同一的时代、同一的阶级的同样的理论,也有眼界的不同,视野的不同,观察力的不同。一个思想家如果不能及时地发现本阶级流行理论的缺陷或不足,就不能克服它的不足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更难以推进扩大它的优势。如果不能发现对立阶级或其他阶级、阶层的相关理论的局限性,就难以体现本阶级的思维、理论的优越性。所以,批判对理论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只有在……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古代的、东方的经济。”^②自我批判意味着批判者对自身、对他方、对历史的超越。资产阶级尚且如此,“资本的政治经济学”^③尚且如此,何况是无产阶级,劳动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说:“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中国发展经济学》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来说,批判也是理论本身的成熟、范畴及体系的科学化的标志,是理论显示其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的实践价值、彻底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传统《发展经济学》的标志。

二、理论批判的科学含义

所谓的批判,都是由一定的主体实施的。各种主体所处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水平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501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资本论》第1卷第17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④ 《资本论》第1卷第24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对批判的理解也不同。有的肤浅，有的深刻。被批判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随之，批判的手段、机制也有不同。在革命的和先进的阶级看来，批判性是全面的，历史的。从对旧制度的批判看，批判有理论的批判，也有武器的批判。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的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可见，理论的批判一方面要通过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来摧毁落后反动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为了掌握群众，理论本身还必须是彻底的。而彻底的理论必然是批判的。在马克思看来，理论的批判并非如常识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单纯的“破”，还包含有“立”。

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②可见，理论的批判并非只是“摧毁”、“抛弃”，还有“说明”。惟有创建，“说明”才能彻底。也只有彻底，才能从旧的东西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抛弃”其余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我要破坏，我也要建设。”^③在《资本论》中，理论的批判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它有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非科学成份和庸俗经济学而言的，二是就自己的理论而言的。从前一种意义看，它是特殊的批判，因为它体现了主体的目的、价值，显示了批判的特殊对象。这种批判具有特定的目的性和相对性，它至少包含几种含义：

首先，是对流行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总的清算。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述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④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清算，还涉及它的哲学，特别是其方法。任何理论都是特定理论家的世界观、方法论的体现，要批判它不能不涉及贯穿其中的哲学、方法。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派别层出不穷，但在世界观、方法论上，都毫无例外地将一般的和特殊的东西混为一谈。一般的东西具有超越时代、阶级、社会发展阶段的性质，而特殊的东西则属于特定的社会、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在有的场合将一般规定等同于特殊规定，以此证明包含有一般规定的资本主义是永恒的；有的则故意不区分两者，让人将其中的特殊规定当成一般规定。因此，其理论是混乱的、以偏概全的，但这恰恰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其次，是代表无产阶级^⑤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恩格斯说：“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⑥这种批判是对象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也是辩证方法所使然，更与这一理论的深化与外化、追根溯源有关。

这两方面批判，前面已有涉及，但并不是这种批判的全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⑤ “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资本论》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再次，是批判地建树。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为止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结果……”。^①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和建树并不是对立的，甚至是建树的前提。他说过：私人劳动的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②“这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③正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批判的基础上建树的情况还有很多，例如，他通过分析批判“斯密教条”，不仅研究、创立了科学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理论，而且还由此而考察了事物内在规定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从而阐明了价值规定的外化、异化；还有，通过批判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破产，研究和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商品价值的转型，等等。在研究资本运动的场合，这种批判地建树的情况就更多了。

最后，马克思的叙述即逻辑过程本身也是批判的。他说：“应该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批判。”^④有一篇俄国的评论也认为：德国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是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至使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同一篇评论还说：马克思“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探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⑤另一篇英国的评论也承认“虽然我们认为，作者的观点是危险的，但仍然不能不承认他的逻辑严密，文字有力，他甚至使最枯燥无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⑥但是，两者之间这样重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文字本身，而在于用科学的方法来组织思想材料，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这就是“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或者说，赋予材料以生命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四个方面，是有机统一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制度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对它们的批判只是角度的区别。科学的研究是为了对旧的制度、思想的理论批判；内容的批判需要批判的叙述，同样的，没有内容的批判，就无所谓批判的叙述。

在马克思这里，除了有上述那些特殊的、狭义的批判外，还有一般的、广义的批判。先进阶级的批判、理论的批判不能是任意的，它实际上是事物本身的发展即新陈代谢所决定的。新陈代谢意味着对象新的发展阶段否定、取代原先的阶段，否定就是批判。客观对象每前进一步，都是对其以前状态的批判。相应的，反映这种对象发展的理论每前进一步，也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和批判。由此观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它没有劳动价值论，却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同时也是自身的发展，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体规定对抽象规定的否定，否定就是批判。这和上述的“批判地建树”又有所不同，具有一般性。

要进行批判，首先要有明确的批判主体和客体，主体要有明确的批判目的。

毫无疑问，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和批判的主体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我们尽可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传统《发展经济学》，但不能毫无批判地照搬其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资本论》第1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3页。

^⑤ 转引自《资本论》第一卷第19页脚注。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⑥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某些现成理论。虽然西方学者中不乏中国问题专家，而且不乏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学者，但恐怕至今还没有一个西方学者敢于标榜他完全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反之，我们到完全可以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都还很抽象、片面、简单、机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个任务只能由当代的中国人自己进行，而不能根据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探索。

中国的经济学界以前曾经是清一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虽然在许许多多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人们有着无穷无尽的争论，但对具体的经济建设问题，都自觉地等待党中央和领导人提出决策后，再进行的论证。这也难怪，中国的问题那么多、那么复杂，那么难，不能没有统一的思想。

但是，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掌握了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其数学工具的学者已经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队伍中分离出来，他们中的有些人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有的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原理也视之为整履，重弹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老调子。在这些学者中，虽然也有大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过多的反感，但却一味照搬西方经济学、传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经济发展。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老理论能否成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立国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不是能够由某个时间、地点的某个事例简单证明的，实际上这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检验过了。我们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有某些变化，现在中国流行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减少了许多西方意识形态等内容，增加了许多关于一般经济发展的内容，同样的，也应意识到中国 20 多年来发生的重大变化，即已经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但是，还没有也不会发生根本经济制度的“转轨”，西方学者的传统《发展经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其中包含的一般规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能够联系得上、如何才能联系得上，这是热衷于此道的学者们尚未论证过的。可以说，在中国流行的《发展经济学》在转述西方学者的某些具体理论时，并没有指出或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些理论规定是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以及在中国的适用程度、条件等等。这些学者打着“理论联系实际”的旗号，试图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理论直接套用于当代中国的实际。

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个很大的论题，其中的理论和实际都是泛指，所以至少包含着三重规定：一是选择理论的主体，在中国，能够选择的主体并只有一类人，即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人才能构成选择的主体。二是选用的理论，显然，它不是指个别具体的理论，而是指成体系的、关系世界观方法论的基本理论。虽然西方学者的某些个别理论也经常翻新，但其世界观是非历史的，方法论是非辩证（非否定）的，它体现了西方学者世界观的特征。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历史证明符合中国需要的基本理论。三是与主体紧密联系的重大实际。可见，企图用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能成为批判的主体的。

一旦确立这样的主体角色意识，面对流行的教科书中那些不合时宜、不合实际的高谈阔论，就会油然而生批判的责任感和欲望。

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作为批判的主体实际上早已存在，但许许多多发展中的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生存”，而不是“发展”，除了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外，大都向老牌帝国主义靠拢。在 60 年代以前，后者对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固有的局限认识不足，

当然谈不上对它的批判。而中国则更多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传统《发展经济学》归结为《西方经济学》，只侧重于“破”，只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没有意识到创立《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表面看，理论批判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于批判主体的理论成熟程度，进一步看，还决定于批判主体所处的时代内容和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无论是最初的《发展经济学》，还是后来变革过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而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正因为这样，对《发展经济学》当然不感兴趣。对它的批判也带有当时计划经济特有的烙印。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①现在，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这意味着中国的批判主体已经可以而且有必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发展经济学》，并将前一阶段对西方学者的传统《发展经济学》转述、吸收消化当成实现这一任务的必要准备。进行批判也有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科学的批判应有一定的出发点和基础。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不同，所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分析批判就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发展经济学》在西方学者那里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对第一阶段的批判，是同一个阶级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超越。而我们现在对传统《发展经济学》（包括其三个发展阶段）的批判，则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对的追求。同样是批判，但出发点完全不同。另外，西方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批判所依据的，或者是新古典主义，或者是新政治经济学，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主体不同，依据的基本理论自然也不同。我们所依据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和他的许多具体理论不同，具有历史性与逻辑性统一的特性，按一定的逻辑展开和发展，所以直至现在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现实意义。

批判的科学性还与批判者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有关。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批判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同样的，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一般经济发展思想的创建、批判是与社会化、工业化、市场化等等过程相联系的，所以至今仍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现在，我们进行《发展经济学批判》也有相当有利的社会经济背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意识到并开始克服少数西方学者的误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泛化和深化。这种形势，也决定着我们的批判具有时代的内容和更高的要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	1
一、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2
二、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具体化	14
三、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	19
第二章 社会资源及环境的优化	22
一、社会资源	22
二、资本及其形成、优化	28
三、人力资本及其优化	39
四、自然资源、环境及其优化	45
第三章 工业化	52
一、工业化是历史必由之路	52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工业化理论的批判	57
三、工业化进程的内容	64
四、中国的工业化	72
第四章 集约化	85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85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增长方式理论批判	88
三、经济发展集约化	91
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99
第五章 市场化	104
一、何谓市场化	104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市场化理论批判	106
三、市场化的内容	109
四、我国的市场化	122

第六章 外向化	129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外向化趋势	129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外向化理论批判	135
三、发展外向化的内容	139
四、中国经济的外向化发展	146
第七章 城市化	153
一、城乡关系的历史演变	153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城市化理论批判	156
三、城市化的内容	159
四、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164
第八章 计划化	169
一、对经济发展计划化的不同理解	170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计划化理论批判	174
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化的内容	177
四、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化	181
第九章 小康化	184
一、小康化是《发展经济学批判》的重要内容	184
二、传统《发展经济学》民生论批判	188
三、小康化建设是个历史进程	191
四、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196
第十章 法治化	205
一、法治化是《发展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205
二、《发展经济学》制度建设理论批判	213
三、发展中国家法治化的特点	217
四、中国的经济发展法治化	221
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3

第一章 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 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

众所周知，科学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要有分析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并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研究经济发展，应该以一般的、基本的规定为基础和出发点。

但是，这种能够成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一般的、基本的规定即基本理论既不是先验的，也不能单纯从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得出。诚然，个别中有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都要遵循一些同样的规律。^①但是，只有比较发展的个别所包含的一般，才是比较成熟而典型的。“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②。毕竟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是松散的。借用流行的术语来说，各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固有的“基因”有巨大的差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在二次战后才突出的，它是现代的现象和过程。在短短的半个多世纪中，各国发展程度不一，即使是最有成效的国家，其经济发展还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不典型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基因”，只有相同的经济不发展的现象。所以，要掌握这种一般规定，只能依据对比较发达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发达国家发展中包含的一般经济发展规定要比发展中国家所能包含的要丰富和典型。^③

但是，即使对同一对象，居于不同的立场、世界观、方法论和理论基础，也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观点。我们发现，即使同一阶级的发展主体、研究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或问题也可能具有不同的看法，何况是不同阶级的发展主体、研究者。在当代世界上，能成为研究经济发展基本理论的只有两种，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是西方经济学。两者虽然都是研究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但由于立场不同，考察的对象层面不同，方法不同，基本理论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对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两者的看法也相去甚远。

应当看到，在西方学者中不乏有识之士，在《发展经济学》的建造和传播上作了很多工作。在他们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不乏传世弘论，这当然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按西方学者的原意和目的，它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主要是要引导和控制发展中国家，使之死心塌地地跟着发达国家走。但是，其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等理论，都既有重大缺陷，也很难经过上升而转化为对发展中国家有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研究目的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局限性。在西方流行的《发展经济学》中，所涉及的一般经济发展理

^① 马克思说：“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同上书第43页）

论比较零碎，比较浅显，各个理论相互之间联系不紧，从中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东西或贯穿始终的逻辑。在它那里，一方面是对一般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某些规定，但并不是非常严谨和科学；另一方面，对特殊的经济发展的研究总是就事论事，不是按“从一般上升到特殊”的程序来展开的，显得杂乱无章。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样的东西当成统一的理论。

各个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不管它们是否有意，都倾向于其中的某种基本理论。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很早就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研究资本运动的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因为这样，它比较抽象。在应用的时候，必定要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联系，并发生必要的具体化、转型。

一、马克思的经济发展理论

为了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马克思也从一定的侧面研究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资本论》中，这些理论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贯穿于整部著作之中，与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等基本理论有机地融合，一起发展。马克思说过：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所以，他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定位为《资本论》的主线。但是，规律是通过过程的展开而变化，而被理解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因此，研究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就是必不可少的。尽管这并非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却是他“实际上提供的东西”^②。由于人们太过重视和熟悉他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以至于忽视他实际上研究和提供的一般经济发展理论。

所谓的一般经济发展理论，是不以特定社会形态为转移的。是关于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等过程一般的理论反映。一方面，这些过程是几个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并不是工业化理论、社会化理论的重述，而应该是其抽象。它的内容十分丰富，要深入了解这一理论，首先应该了解他的发展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经济发展，以至于人们几乎忽视它的存在，但在字里行间，却到处贯穿着他的经济发展思想，借用中国的古语说，它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③。马克思既从关于一般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也在研究特殊的资本运动的基础上探索经济发展。

纵观整部《资本论》，我们至少应该了解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二重性的经济发展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的规律中，有些属于一切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58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③ 《老子》语。其意为：“道”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却似乎听不到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形状。

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更有一些是特定时代特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①。显然,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并非只有一种规律在起作用。所以,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运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那些非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过程。作为与特殊的资本运动相区别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在《资本论》中,主要有商品化、工业化、社会化等几种发展过程。它们的内容各异,时间长短不一。它们不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转移,可以在其中展开,也可以在其他社会中延伸、丰富自己的规定。而且它们还互相联系、相得益彰。社会化借助于商品化而扩展、由工业化而深化,工业化随社会分工的发达而推进、随商品化而升级,商品化以社会化的发展为基础,随工业化的升级而成熟……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当成统一的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

这种二重化过程的认识,是不容易产生的。在资本家看来,人类“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②这种唯心的历史观决定了资产阶级及其学者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资本运动包含的二重性。至于一般的人,在没有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掌握科学的方法以前,尤其在置身于流通和竞争之际,必定会受资本这一“普照之光”笼罩,无法超越资产阶级狭隘眼界,从而无从理解一般的发展过程的存在。只有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根据其“个别之中包含着一般”的原理,才能透过假象对貌似统一的社会经济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揭示这种二重性存在。他认为:“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观念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现实形式。”^③由于实际过程比较复杂,两种发展过程的联系并不那么简单。一般说,一般过程寓于特殊过程之中,但这是指同一种事物,例如资本主义一般和资本主义特殊。显然,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并不是同一种事物。不过,它们也不是毫无关系。一方面,一般的发展过程是寓于特殊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因为商品化、工业化、社会化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总是表现为特殊形式的商品化、工业化、社会化。从这种意义看,一般的发展过程总是带有特殊过程的形式,但决不是只有一种形式。另一方面,从一般的发展过程横亘几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来看,它又是几个特殊的发展过程的共同载体,这样看来,特殊过程只不过是般的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

在科学的世界观指导下区分二重发展过程,即特殊的和一般的经济发展过程,并对之进行研究,必然相应地形成二重经济发展观。《资本论》所体现的特殊经济发展观,人们已经有较多的理解,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其二,突出经济发展主体的地位。

1、经济发展是主体发动、参与并获得改造、提高的过程。

经济过程虽然具有自然必然性,但与自然过程不同,它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有主体参与其中的过程,实际上是由形形色色的主体有意无意共同推动的。没有主体的活动,就不可能有经济过程的产生,没有主体的积极性,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迅速有效。决定经济发展趋势及力度的客观规律虽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是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主体协同作用或对立行为中实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2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资本论》第一卷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4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